



步辇图

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发展史上，有一些被称之为盛世的时期。这些称赞或来自于史家的记述，或来自于政治家的自诩，或来自于诗人、文学家的颂咏，当然，也有发源于百姓内心的赞美。这些美誉或有比较确切的历史文献记载，或是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遥远记忆，甚至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寄托，却构成了中华政治文化传统、社会治理理想追求的一个重要部分。

盛世考义

盛世是一个历史概念。《说文解字》释“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约在春秋时期，“盛”从器皿的本义转化为丰满、盛大、兴盛。《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即此意。贾谊《过秦论》：“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将盛衰二字并列，作为社会发展的两种状态，意即盛世和衰世。

盛世一词出自东汉。《后汉书·崔骃列传》载崔篆所作《慰志》赋：“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意指盛世的天空多么广阔，虽经历千载依然会闪耀着光辉。后崔篆的孙子崔骃因外戚窦宪富贵而骄傲，向他进言：“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意告窦宪富贵声名日隆，百官羡慕，就像处在尧舜盛世一般，岂可不日夜奉公，永葆美誉，像周宣王时的申伯、西周初年的周公邵公一样，尽心辅政君上，弘扬他们的美德。崔篆、崔骃所说之“盛世”，都是以尧舜时代为榜样，与《论语·泰伯》所说的“唐虞之际”含义一致。而所不同者，是他们把本朝视为盛世。

自盛世一词出现后，以盛世指称我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者古今皆有：一是历代史家、文人和政治家。如宋陈藻《乐轩集》卷8：“三代而下，惟汉与唐为盛世。”清代康熙中叶后，以盛世称颂本朝更成风气。如康熙朝《万寿盛典初编》卷4：“天长地久，祝暇年得生盛世。”雍正朝《世宗宪皇帝朱批陈时夏奏折谕旨》卷11上：“今日之盛者也，臣恭逢盛世。”清代的一些地方志中也常有盛世之称。二是今日学者对我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期的概括。综上可知，称盛世者既有古人，也有今人；既有他称，也有自称；既指理想，也指现实。可以说盛世是历史概念，也是文化概念。

应当注意我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盛世与治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盛世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早在盛世一词出现前，已有“治”“治理”“治世”“治道”等政治文化概念。不晚于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已使用这些概念作为国家管理的一种方法或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指称某些历史时期。做到“治”或“治理”的时期，就是治世。治世与盛世的含义基本一样。比如，二者都把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追溯到尧舜至三代。历史上被称为盛世的时期，也往往被当时或后人称为“某某之治”，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唐吴兢《贞观政要》卷第2：“贞观之治，可以为盛矣。”此处治、盛并举互用。因此，盛世一定是治世，治世则是盛世形成的基础与表现。当然历史上还有“兴”字，其含义往往亦与“治”“盛”同义。如“兴衰”即“盛衰”。

说盛世

卜宪群

盛世的内涵

上述表明，我国历史上已有盛世的概念，也存在着被当时或后人称为“盛世”，即治理比较好的历史时期。那么，除去那些传说时代的“盛世”之外，我国历史上治理比较好的盛世时期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下面试从文献出发，就历史上盛世的核心内涵谈几点看法。

其一，以民为本，盛世的题中之义。《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史料记载来看，我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时期，民本都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被视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西汉初年，其政治的突出特征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节俭戒奢。如汉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其慎夫人“衣不曳地，帟帐无文绣”。汉景帝在位16年，多次下诏重视民生，涉及徙民宽大地之、赐民爵、减田租、劝农桑、省官用等；提出了“农，天下之本也”的著名思想；倡导轻“黄金珠玉”而“务劝农桑”的社会风尚；整顿吏治，严惩“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官吏。故班固《汉书·景帝纪》赞说：“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高峰是唐代初年。当时，百废待兴，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一代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内涵很多，但民本措施是其核心，如《贞观政要》所说：“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汉唐的文景、贞观之治为后人所称道者，人民富足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反之，如果缺失了民本的支撑，就不构成盛世。

其二，选贤任能，盛世的人才基础。盛世是人而不是神创造的。把时代所需要的人才选拔好、管理好，是盛世形成的重要基础。盛世必是治世，治世必靠贤才。一是广招贤才。汉文帝“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首开汉代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科目。汉景帝将“誉算十”减到“誉算四”，以使更多廉士不受财产限制而入仕。唐太宗“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汉唐盛世形成与其人才选拔方向的正确关系甚密。二是广开言路。盛世需要听取不同意见。汉文帝指

出：“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唐太宗“乐闻直谏”，“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三是严格吏治。如果没有严格的吏治，盛世即使出现也不会长久。汉宣帝“每拜郡守刺史必亲见”，“此所以州郡多循吏，而天下皆治安也”。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清谨”。

其三，礼法合治，盛世的根本保障。“法者，礼之端也。”尽管我国历史上多以“刑错不用”来描绘盛世，但绝不等于说盛世可以离开法治。相反，法治，是盛世的根本保障。盛世的法治一方面是能够顺应社会、顺应民情，用法得当。汉初扫除秦之严刑苛法，“去肉刑”“罪人不帑，不诛无罪”，受到普遍欢迎，对社会稳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慎刑。唐太宗“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也是对隋代滥用刑罚的反思。唐初对死刑案实行“三覆奏”，唐太宗因错杀张蕴古，又令改为“五覆奏”。对死刑的慎重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慎刑原则的具体体现。轻刑慎罚，务存宽简，疏而不漏，是盛世法治的基本特点。盛世是依靠法治维护的，但徒法不能以自行，历史上盛世法治的基本特点是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简单地说，就是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等德的伦理与法治秩序结合起来实施，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文景之治注重“以德化民”，不仅海内殷富而且兴于礼义，移风易俗，黎民淳厚。宋人称贞观“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正是礼法合治的成效。盛世必包括社会道德的弘扬，社会风气的净化，其中礼义教化是不可缺少的内涵。相反，人无礼信，风俗浇薄，绝不是盛世。

怎样看待历史上的盛世

首先，盛世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政治文明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盛世的理想描绘，以及实践中的不懈追求，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创造出中华文明的一个个高峰。这份遗产我们今天仍然要继承。

其次，应当深入挖掘我国历史上盛世的核心内涵。从语义上看，我国历史上盛世与治世的含义是同一的，盛世即治世，治世即盛世，二者可以互称，这为我们理解盛世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从内容上看，我国历史上赋予盛世的核心内涵是以民为本、选贤任能、礼法合治而非其他。正因为此，古人不把那些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严刑峻法者统治的时期视为盛世，而是把那些民本、任贤、法治精神实施比较好的时期视为盛世。古人对“盛世”内涵的这种认识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

最后，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观察分析历史上的盛世。既要看到它在我国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其阶级本质，不能盲目地虚誉夸大，也不能简单否定。就今天来说，我们更多地是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盛衰的经验教训，挖掘其核心观念，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有所思

达之四海的《袁氏世范》

□ 万 翔 俞云龙

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不啻是悠久历史的惠赐。古往今来，历代贤哲造就了诸多训导人伦教化的名著，使中华文化具有了独树一帜的文教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的言传身教造就了世界各大文明中最早成系统的文教学说和伦理规范。到南北朝时代，名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开创了家训类著作的源头。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鉴戒》、宋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莫不类此。先贤遗教围绕着家庭和睦与个人修养等主题，直至今日都是教育纯良的示范。

袁氏其人其时

对坐落着南京孔庙、长期受惠于传统文教的浙江衢州来说，伴随丁酉新年而来的喜报，是本地先贤袁采所著，可与《颜氏家训》等量齐观的文教制度之作《袁氏世范》，已经李勤璞先生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袁采（约1140—1195年）正史无传，其生平事迹除见载于地方志外，仅见于同时代人杨万里荐举袁采等四人政绩的奏状（1192年，收入《杨万里集》）和朱熹《与潜司札子》（1193年，收入《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先贤出生于南宋时代的西安县，即今天的衢州市衢江区，早年做过学生，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在萍乡县任主簿后，辗转于乐清县、政和县、婺源等地担任知县，官至监登闻鼓院（或监登闻检院）。袁采任职时，致力于清明吏治，勤勉施政，于其著述中可见一斑。明清以来的乐清、政和县志都对袁采褒扬有加。同时代名士杨万里奉命调查官员政绩时，特别提到时任徽州婺源县知县的袁采，称赞他“三衢儒先，州里称贤，励操坚正，砥行清苦，三任壮仕，皆属最声”，三任知县时都蜚声乡里，特别是到婺源以后改革弊政，“自是诸邑之民，皆得安堵”。这位德操高尚、勤政爱民的一方父母官，是当时淳良世风的表率。

南宋时代，随着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和纸币的广泛发行，商业和文教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中国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朱子理学较之北宋二程影响更大，由此礼教和文明程度空前。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促使“人心不古”的经济投机活动；北宋中期以后兴起的赋税过户承包催生了结托豪民的揽户，往往由县衙胥吏垄断。揽户收取来自农户的优质产品，上缴官家时换成劣质的，且常不给农户开收据。尤为紧急的是，在与皇帝

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阶层和实际充当官民中介的胥吏阶层之间，缺少简单明了的是非利害之教，于是中央的清明政治，最终在地方商品经济中出现的投机行为蛀噬下垮塌了。南宋一代的教训，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俗训”实为“世范”

此社会大转折之际，终有深谋远虑之贤者，以自身持家、修身、从政经验为鉴，敏锐察觉到士族大家文教不下世俗的不足。此即袁采立言之根本，也是他与朱熹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袁氏世范》后序中，开篇指出：“近世老师宿儒，多以其言集为语录，传示学者，盖欲以所自得者与天下共之也。然皆议论精微，学者所造未至，虽勤诵深思，犹不开悟，况中人以下乎？”袁采则不同，他寄望“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目间”。读者群体是普罗大众，因此点校者李勤璞先生评说此书行文“浅显而直率，普通乡间不识字的人也能懂”。这部书起初拟的名字是“俗训”，就是论“世俗事”，内容超过一般家训的范围。但其同僚刘镇（1110—1165年）读罢，称赞此书“岂唯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于是在代序中名之为“世范”。

《袁氏世范》全文共三卷，第一卷“睦亲”谈的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各种亲属关系，第二卷“处己”讲为人修养和处世交际的问题，第三卷“治家”则讨论具体处理家务的办法。全文以语录的体例完成，每卷之下分条目叙述，其中间有案例记载和古谚引用，行文简短明快。传世宋刻本各条的页眉有后人添加的识语概括要旨。后来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刊行的《知不足斋丛书》刻本中，这些识语便作为每一条的标题存世。

卷一“睦亲”从父子兄弟“不和”谈起，以后人所识的“性不可以强合”为第一条，顺序谈论了父子、兄弟、儿女、共居、分业、宗亲、结亲、遗嘱等事项和关系。将“睦亲”放在“处己”之前而列于文教指导的首位，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本质的深刻、辩证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驳斥庸俗人性论时所指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的出发点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及由之所决定的个性的多样性。《袁氏世范》开篇的两条“性不可以强合”“人必贵于反思”，特别强调了由亲属关系带来的对个体异质性的尊重和对人际关系反诸自身的思考。本卷前半部分论及“慈孝”“宽容”“处忍”“诚笃”“爱憎”时，都分别

以父子、长幼换位思考，说理得当，譬喻精到，而后半部分具体的“爱惜子孙”“长幼贵和”“相处贵宽”等说教和对教养、立嗣、收养、嫁娶、立嘱等方面的建议，以深思熟虑的人际分析，落实了对家庭和睦周全而负责的态度。读罢此卷，虽无一字提及个人修身养性，却能体味作者教化民众的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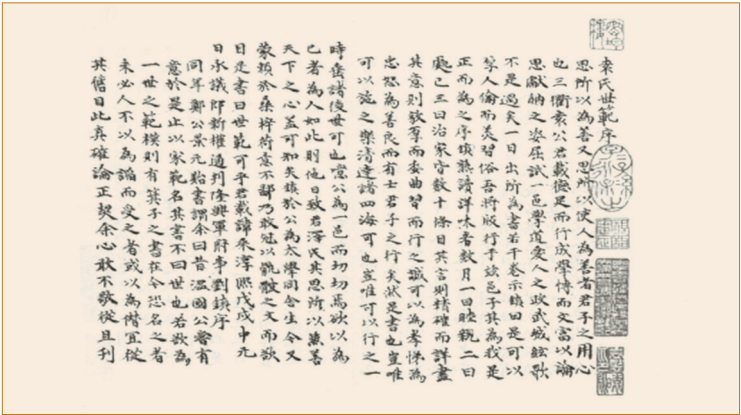
由此以及卷二“处己”，作者把对“自我”的修为放到亲属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之次。如果说卷一完全是在社会关系中为人性作合理的定位，卷二则是审时度势，议论现实的人生百态。日本史学家，专攻唐宋社会史的大泽正昭以“现实主义”指称袁采的思想脉络，大抵来自于此篇中透露的观点。《袁氏世范》在解读读者的天赋和命运时，认为人“智识固有高下”，“富贵乃命分偶然”，“操履与升沉，自是两途”，而天资“各有所偏”，性行“虽有所短，必有所长”。此论与西方政治传统中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有殊途同归之妙，但更是卷一所叙述的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上个人禀性上的反映。基于以上对人性综述，袁采提出了关于处己、待人、接物、处事、言语、为人、用度、施受、为官的一般原则。此卷叙述颇多征引古圣贤语，又常贵以譬喻例证，下笔生动明快，令人手不释卷，最适合引以为修身之诫。

卷三“治家”，顾名思义，多是以家长的角度出发，对治理家庭事务的经验总结。概括起来，这一部分大致分家宅、奴婢、田产、债务、赋税、营造等主题。与前两卷对中国宗族制度、人伦观念作社会的考察有别，第三卷集中反映了袁采所处时代与地域生活的特征。如论及家宅防盗防火时，作者充分考虑了对邻保制度的利用，提出睦邻里以防不虞的主张；至于雇佣婢仆，则从人伦、乡土、契约等多方面考虑，审慎述其经验；对分割田产、借贷纳税等经济事务，更是穷尽案例，从细节上推敲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害，以提供最全面详尽的治理方法。其中对牙保（中介人）、揽户等行为的分析，大抵来自于知县任上处理的民间诉讼等事务，对过度投机等行为，提出了防御的办法。行文如此严密理性，无怪乎袁采能够在三任知县上都取得美誉，在乐清县和政和县更是被列入名宦祠中，受到后世百姓的供奉。

于今意义犹在

杨万里奏状中区区八品奏议郎的袁采，在南宋时代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袁氏世范》微言大义，对今日之中国依然有谏言和警示的作用。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南宋以来最为深远的变革——一方面，改革开放实现了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交往媒介从南宋的“活字印刷革命”飞跃至今天的“社交媒体革命”。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着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观念的差异。因此本书中对家庭关系和社会治理的“俗训”，实际上是基于中国传统文教观念下，对人伦关系作普世性的规范。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流传至今依然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中华春秋



（上接1版）
学习时报：《意见》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安全生产的推动作用，请问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
杨焕宁：发挥市场机制的推动作用，是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思路创新、机制创新。我们将要制定相关制度办法，从培育支持和依法监督管理两个方面，加快建立主体多元、覆盖全面、综合配套、机制灵活、运转高效的新型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培育支持的角度上，要加快完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服务机构资质管

理制度，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技术服务品牌机构。大力推行安全生产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建立保险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事故预防合作机制，发挥风险预防控制作用。加快健全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制度，实施全国统一考试，实现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化。完善政府购买安全生产服务制度，鼓励中小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委托、合作的方式购买安全管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管理的职能，不断拓宽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范围。

从监督管理的角度上，要推进实

施专业服务机构信息公开制度，规范市场服务行为，完善技术服务标准，明确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资质管理，严把审批条件和程序关。严格执法检查，对事故负有责任的机构和人员依法实施行业禁入和职业禁入。严格信用管理，充分发挥安全生产联合惩戒机制和“黑名单”机制的作用，强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学习时报：近几年，一些地区曾发生多起重特大事故，损失惨重，尤其是以前很少发生重大事故的行业也发生了“想不到”的事故，在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上有什么特别的措施？
杨焕宁：近年来，我们把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牛鼻子”和关键性问题来抓，取得了明显成就。下一步，我们要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加强对“想不到”“管不到”问题的深入排查和有效管控，研究出台全面加强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的指导意见，把安全生产作为高危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实行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继续实施“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专项行动。加

快建设一批重大安防技防工程。

积极推行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指导和推动各地和企业按照《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要求，健全风险认定和管控相关标准规范，推动各地普遍推行红橙黄绿四色风险管控机制。加强电力、城市燃气、高铁、民航、化工园区等行业领域安全防范，严防引发公共安全事故。

加强工作指导。重点指导中西部地区从本地实际出发，强化预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在深入

总结推广遏制重特大事故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督促各地区层层抓试点，以点带面，进一步扩大成效，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以贯彻执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煤矿安全监察执法手册》等为抓手，坚持严字当头，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执法行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检查多执法少等宽松软问题，抓一批违法违规典型，处理情况在主流媒体曝光，达到“惩治一个、震慑一片”的效果。